

中国人口红利的理论建构、 机制重构与未来结构*

原新 金牛 刘旭阳

【摘要】国内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对人口红利的误用和误判问题,主要是由于现有的人口红利概念过于模糊,判断标准相对静态。文章根据人口机会、国情现实和主导作用,廓清了基于人口机会的人口红利概念,并将人口红利划分为由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效应主导的数量型,由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主导的质量型,以及由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效应体现的配置型3种类型,初步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基于理论建构,文章从人口机会和政策环境的转型过程重构了人口红利的动态机制,由此提出中国人口红利未消失和正处于转型期的判断,并认为其未来结构将以质量型人口红利为主导,数量型人口红利尚存但收获难度加大,配置型人口红利正在转型升级。

【关键词】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转变 人力资本 效率配置

【作者】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旭阳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口红利是典型的舶来词汇,一经引入,便在中国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广泛使用。由于缺少规范的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国内相关研究对人口红利的使用过于泛化,导致一些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尤其是“人口红利消失论”一度引发社会热议。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作出“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和“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官方判断,基于此,从学术规范视角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迫在眉睫。

一、中国人口红利的理论建构

(一) 人口机会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基础

西方学者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在人口转变的某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大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7)的阶段成果。

且比重较高,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构成的被抚养人口数量较小且比重较低,形成劳动力供给充足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的人口窗口或机会窗口,在适宜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可以产生经济增长效应,称为人口红利(Bloom等,1997、2003)。由于概念、逻辑和判断标准的差异,关于人口红利的后续研究时常出现不同观点。

1. 建构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统一概念、逻辑。一些学者混淆了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当人口老龄化、持续低生育水平等规律性的人口结果出现时,便将这种人口机会减弱的现象视为人口红利消失的征兆,缺乏对现象背后问题本质的研究。实际上,人口机会是人口发展规律性变化所形成的客观条件,人口学研究领域一般将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态,即被抚养人口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形态称为人口机会,将该形态的特定持续时期称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是建构在人口机会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是指在人口机会窗口内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充分激活人口机会的动力机制;通过供给侧影响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需求侧影响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从而传导性地产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人口机会建构人口红利概念,审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助于避免陷入人口决定论的思维陷阱,同时把握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支撑要素的重要地位。

2. 建构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动态判断标准。悲观派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总抚养比上升为标志(蔡昉,2010),或依据总和生育率将世界各国或地区划分为前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早期、人口红利后期和后人口红利等类型(World Bank,2016),或综合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生育率指标的下降趋势和抚养比指标的上升趋势,认为人口红利的来源已经枯竭。乐观派则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总抚养比不超过50(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100)的人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开发潜力较大(陈友华,2005;原新等,2017),联合国的另一标准是人口年龄中位数小于40岁、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不超过30%和15%。悲观派以劳动力和生育率等指标的下降趋势断定人口红利消失;乐观派以范围指标表征人口机会窗口,为集中开发人口红利提供时期判断,但由于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存在缺口,且该指标缺乏时期动态性,必然存在衡量误差,在实际运用中不能完全照搬。

(二) 研判国情是建构人口红利的前提

人口红利概念形成以来,世界人口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特征,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演变,在实践中不断推动人口红利理论研究取得新进展。有学者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所蕴藏的机遇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时代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能和养老储备引致的储蓄率变化,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效应,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时期的人口红利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以示区别(Mason等,2006),开启人口红

利分类研究的尝试,增强了人口老龄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信心,但本质上仍未脱离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定义人口红利的框架。人口现象是长周期事件,对于人口基数巨大的国家而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依然庞大且占比较高,仍然存在释放人口红利的较大空间,且大国人口变动在内部存在区域差异,形成了人口“削峰填谷”的腾挪空间。西方学者定义的由老龄化推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看似合理,实则易产生次序矛盾,即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替代,忽略了二者的交织性和协同性。因此,将第二次人口红利归类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第二阶段更为合理。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与年龄结构转变所开启的人口机会窗口高度匹配,适时将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及时检验了传统人口红利理论,为完善人口红利研究提供了试验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2020年降至1.3,少子化特征增强;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快速提升,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10年达峰后下降,其数量自2013年达峰后减少,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弱,人口总抚养比不断攀升。这些人口机会的收缩变化使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甚嚣尘上,加剧社会焦虑。鉴于此,客观准确地研判中国人口红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迫在眉睫。

(三) 主导作用是划分人口红利的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快速转型,城市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空间载体,长期厚积的劳动力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助推“世界工厂”的筑建。在这一阶段,基于人口转变理论,从人口数量结构视角以数量型人口红利(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主导)阐释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现实性,并可以从1978~2010年年均增速超过1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相关数理模型中得到验证(杨成钢、闫东东,2017)。

1. 数量型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主导作用更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达峰转降、劳动力成本上涨、局部地区结构性招工难等现象的出现,若仅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出发观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容易产生人口红利理论的困惑。例如,有学者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人口动力来自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该时期劳动力供给增长超过劳动力需求增长,近似无限供给,随着劳动力供给出现下降趋势,便得出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既忽略了中国人口基数大和经济转型快的现实国情,也忽略了人口惯性发展的规律结果。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数量结构优势尚存,但主导作用逐渐让步于人口质量优势,以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为表征,从质量型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主导)出发观察人口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大势已趋,并在相关数理模型中得到验证(Li等,2016)。

2. 配置型人口红利基础作用的内部转型。数量型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开发均离不开人口流动下配置效率的提升。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仅假设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实际上,制造业还可细分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不同梯度,劳动力会从低附加值制造业流向高附加值制造业,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只要存在产业升级,便可以推动人口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子产业间流动,提升配置效率,产生人口红利(林毅夫,2017)。这是从要素禀赋视角和资源配置纠偏过程出发,以配置型人口红利(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效应)考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数量型人口红利主导期,配置型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群体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单向流动,以劳动参与率提升为核心,产生额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质量型人口红利主导期,配置型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多向流动,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核心,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二、中国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一) 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1. 人口规模变迁。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为10.08亿人,突破10亿大关;1990年增至11.34亿人,8年间增加1.26亿人;2000年增至12.66亿人,10年间增加1.32亿人;2010年增至13.40亿人,10年间增加7389万人;2020年增至14.12亿人,10年间增加7206万人。总体上,全国人口增速放缓,但规模依然惯性扩大,庞大的人口基数在总量方面提供的人口机会,是培育市场容量的重要基础。

2. 年龄结构转变。人口转变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和老年型转变,但目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较大、比重较高。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整体下降。1982年为33.6%,1990和2000年连续降至27.7%和22.9%,2010年处于普查数据最低值16.6%,2020年微升至18.0%。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先升后降。1982年为61.5%,1990和2000年连续升至66.7%和70.2%,2010年处于普查数据峰值74.5%,2020年降至68.5%,与1990年前后比重相当,但数量增加超过2亿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1982和1990年分别为4.9%和5.6%;2000年升至7.0%,标志老龄化社会的到来;2010和2020年分别升至8.9%和13.5%,人口老龄化加速演进。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6.20亿人增至9.98亿人,为经济高速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缓升,人口总抚养比从62.6降至34.2,持续减轻社会抚养负担。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9.98亿人减至9.67亿人,劳动力资源有所缩减,但仍然

充盈;同时少儿人口数量从 2.22 亿人增至 2.53 亿人,适当补充了未来的劳动力资源;总抚养比升至 45.88,仍处于人口抚养负担较低的时期。

(二) 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1. 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快速改善。(1)平均预期寿命增速加快,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 年为 67.8 岁,1990、2000 和 2010 年连续增至 68.6 岁、71.4 岁和 74.8 岁;根据《2019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增至 77.3 岁。此外,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全球前列,2019 年为 68.5 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63.7 岁和欧洲地区平均水平 68.3 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2)主要死亡率指标大幅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1~2019 年,新生儿、婴儿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 33.1‰、50.2‰、61.0‰降至 3.5‰、5.6‰、7.8‰,孕产妇死亡率从 80/10 万降至 17.8/10 万,在 2007 和 2014 年已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相应要求,被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

2. 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大幅提升。(1)人口受教育状况改善。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2020 年,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从 2.3 亿人减至 3 775 万人,文盲率从 22.8%降至 2.7%;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5.30 年增至 9.91 年。(2)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1982 年受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人口比重为 0.62%,1990 年增至 1.42%;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开始后,2000、2010 和 2020 年分别增至 3.61%、8.93%和 15.47%。2020 年,16~59 岁人口中,43.79%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23.61%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升至 10.75 年。

(三) 配置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1. 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 和 1990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仅为 0.07 亿人和 0.21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较低,分别为 0.7%和 1.9%;21 世纪以来,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0、2010 和 2020 年分别增至 1.21 亿人、2.21 亿人和 3.76 亿人,比重相应升至 9.6%、16.5%和 26.6%。

2. 人口向城镇和东部地区集聚。(1)人口向城镇集聚。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2020 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 20.9%升至 63.9%,城镇人口增加 6.91 亿人,年均增加 1 819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2.88 亿人,年均减少 757 万人。2020 年,流向城镇的人口为 3.31 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88.12%,比 2010 年提高 3.85 个百分点;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 2.49 亿人,比 2010 年增加 1.06 亿人,流向城镇的人口比重仍在提高。(2)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1982~2020 年,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快速上升,从 34%升至 40%;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从 28%、29%和 9%降至 26%、27%和 7%。2020 年,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比重达 73.54%,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 7.65%、15.06%和 3.75%,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比重仍较高。考察人口增长较多的 5 个省份,广东、浙江和江苏的人口增长动力主要是人口流入,山东和河南则是基

数扩大效应。

3. 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高效集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201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从68.1%降至25.1%;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先升后降,从1982年18.4%升至2012年30.3%,2012年至今呈下降态势,2019年降至27.5%;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13.4%大幅升至47.4%。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差距从35.3%缩至18.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应差距分别从-26.2%和-9.2%缩至-11.1%和-6.9%。

三、中国人口红利的政策环境

(一)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政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1999年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2000~2010年超过10%,增长速度领先全球;2010年GDP达到41.21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一阶段的人口红利以数量型为主导,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配置型人口红利为基础;相关政策环境聚焦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适时将数量型人口机会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效应。

1. 围绕市场、产业和贸易政策,全面激活劳动力需求。(1)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迈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进步伐;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五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框架;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实施差异化的产业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1980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在沿海地区开放14个港口城市;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此外,还陆续开辟经济开放区,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集聚,有效激活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需求。(3)推动贸易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贸易政策注重奖出和限入相结合。十四大提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开启中国减少进口限制和优化出口环境的改革进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外资带动出口加工业蓬勃发展,劳动密集型岗位激增,充分利用起中国劳动力的数量和城乡配置优势。

2. 聚焦人口、性别和就业政策,有效盘活劳动力供给。(1)实行人口控制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此后陆续经历“三个多了”“两个不少”“独生子女”“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数民族自治”的多元紧缩型政策演变,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有效延展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行为,厚植数量型人口红利。(2)推动性别平等事业建设。1995年“男女平等”被确定为基本国策;2005年修订的《妇

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性别平等有利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拓宽数量型人口红利,同时通过代际传递提高人口质量,孵化质量型人口红利。(3)实施劳动力转移政策和就业制度改革。一方面,劳动力转移政策逐渐宽松。1984年发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1986年发布的《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允许有条件的农民落户城镇及进入城市国营企业就业,劳动力转移政策由限制型转向鼓励型。另一方面,就业制度更加市场化。1986年开始将统包统配的计划就业制度向新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和老职工保留固定工制的双轨制度转型;1995年实施《劳动法》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建立市场导向就业制度。

(二)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环境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在8%以下持续放缓,2012~2015年为7%~8%,2016~2019年为6%~7%,经济由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驱动为主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驱动为主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中国人均GDP持续增加,2019年超过1万美元,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取得良好开局,这得益于高效开发了起主导作用的质量型人口红利,以及深度开发了起基础作用的配置型人口红利。

1. 提升人口质量和城镇化水平,培育新型人口红利。(1)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十九大正式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强调“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把以预防为主的人民健康管理体系上升到重要高度,卫生健康事业的公益性逐渐增强。(2)落实教育强国战略,提升教育人力资本水平。2015年启动“双一流”建设,策应创新驱动战略下提升科研实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2019年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分流培养技术人才,策应制造强国战略下发展实体经济所需。此外,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等教育扩招,虽然带来教育质量风险,但大规模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孵化质量型人口红利起到积极的作用。(3)从开放空间到权利赋能,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流动空间开放化,流动人口集聚推动空间城镇化快速演进(原新、金牛,2021)。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空间开放向权利赋能转变,聚焦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福利共享,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等,进一步丰富配置型人口红利配套政策;2014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籍性质区分及蓝印户口等,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为推动教育、卫生、社保、住房等民生福祉与之相适应廓清了基本前提。人口流动迁移既是劳动力就业性质的转变,也是劳动力价值的深度开发,在宏观经济领域表现为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双提高。

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活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1)实现资源配置组合优化转换。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八大,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增强,但仍处于量变阶段,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决定性地位相比,市场最多居于基础性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开启资源配置组合的质变阶段(高培勇等,2019),为高效开发配置型人口红利提供基础机制。(2)促进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完成工业化,使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实现轻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完成服务业对工业主导地位的替代,广泛吸纳劳动力就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更多地体现在产业内部,十九大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部署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战略方针,为优化配置型和更好发挥质量型人口红利拓宽空间。(3)推动消费市场转型。经济高速增长提高了居民收入,人口老龄化带来消费偏好变迁,形成市场潜力庞大的银发经济需求,使中国消费市场转型内生动力充足。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注重需求侧管理,指明了国内消费市场转型的基本方向,为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红利开发提供强大的市场基础。

四、中国人口红利的未来结构

(一) 基于人口机会的中国人口红利未来结构转型判断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恰逢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及人口总抚养比不断下降的黄金期,期间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环境极大释放劳动力供需潜能,在其推动下收获主导性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在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的过程中激活基础性的配置型人口红利,创造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达峰转降,“十四五”时期随着深度老龄社会快速到来,以及2026~2027年前后人口负增长的临近(王广州、王军,2019),数量规模和年龄结构方面的人口机会大幅收缩,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主导作用势必下沉,但人口基数巨大和区域差异提供的腾挪空间优势不容忽视。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人口红利的主要发力点正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其未来结构以质量型为主导,数量型尚存但收获难度加大,配置型正在转型升级。

1. 质量型人口机会持续向好,厚积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主导之势。新时代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离不开前置阶段相应人口机会的量变积累,整体而言,2019年高等教育实现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阶段跨越;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当年在学总规模为4183万人^①,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人口累计达到2.2亿人;“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毛入

^①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03/t20210301_516062.html),2021年3月1日。

学率将提至 60%^①,将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大幅缩小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其年均在学总规模约为 5 000 万~6 000 万人,据此推算,2025 年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人口累计将超过 2.5 亿人,2030 年将超过 3 亿人,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在目前 9.91 年的基础上增至 12~13 年。聚焦低龄老年群体,一方面,根据七普数据,目前在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60~69 岁低龄老年人口比重为 55.83%,是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同时,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口比重达 13.90%,比 2010 年增加 4.98 个百分点,老年人受教育状况大为改观,奠定了老年人口红利开发的基础;另一方面,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60~64 岁人口受教育结构,到 2050 年该年龄组初中及以上、高中及以上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人口将升至 92.6%、46.1%和 25.3%,人力资本水平还将大幅提升。

2. 数量型人口机会隐性化,数量型人口红利收获难度加大。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9》中方案预测数据,考察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下的劳动力资源,2020~2050 年,16~54 岁女性人口将从 4.0 亿人降至 2.9 亿人,16~59 岁男性人口将从 4.7 亿人降至 3.7 亿人,二者合计从 8.7 亿人降至 6.6 亿人,劳动力蓄水池有所收缩,但依然充盈;在未来 30 年内,若将男性和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均渐进式延迟至 65 岁,会有 0.9 亿~1.2 亿 55~64 岁女性人口和 0.4 亿~0.6 亿 60~64 岁男性人口从低龄退休人口转为年长劳动力,合计达到 1.3 亿~1.8 亿人,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所导致的数量型人口机会削弱问题。国际比较而言,到 2050 年,中国 16~64 岁人口为 8.3 亿人,比发达国家合计多出 0.9 亿人,是美国和欧洲的 3.6 倍和 2.1 倍。但这种人口机会具有较强的隐性化特征,激活相应人口红利对政策环境的依赖性较大。

3. 配置型人口机会快速升级,蓄积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巨大潜能。一方面,地区间人口流动仍然活跃,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202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中国人口的空间变动实现了由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转变,并且流动迁徙成为常态化的人口空间运动特征还将长期保持,根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5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 65%,2030 年将达到 70%,纵使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来临,预计实现这些人口城镇化目标后,城镇人口还将持续增加,吸引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和铁路沿线的城市地区集聚;另一方面,产业间劳动力流动效率提高,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效率将继续大幅改善,集聚协调度也将达到更高水平。

(二) 支撑中国人口红利未来结构的政策环境方向

1. 增加人口机会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从计划生育管理转向家庭计划服务,致力人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 年 3 月 13 日。

口健康和教育质量提升事业。基于“三孩”生育政策,继续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尽快构建与优化生育政策配套的经济社会政策体系,并推动政策体系有效落地,发挥生育政策的预期效果,推进生育率向适度水平迈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增加数量型人口机会;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把生育孩子数量的选择机会交给家庭,政府更多地承担起提升人口健康和教育质量的公共职责,将“健康中国”和“教育强国”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和高品质的教育体系,强化质量型人口机会。另一方面,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劳动力供给问题。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本质上是在健康状况改善和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以及因受教育水平提升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平均年龄的条件下,通过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增加生命周期中的生产性时长。延迟退休既可以将低龄退休人口转为年长劳动力,增加数量型人口机会;也可以利用人力资本快速积累的机会优势,尤其是在健康中国行动下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增长,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手段不断减轻体力劳动强度的背景下,充分激发老年人力资本动力,增加质量型人口机会。

2. 优化人口红利的政策环境。从产业、市场、就业和空间配置方面,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依托协同并行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推动劳动力开发模式从提高劳动参与率为主向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转型。一是健全现代产业体系。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调动科技、金融和人才动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深化人口红利开发的供给侧改革。二是构建新型市场格局。充分发挥国内人口基数巨大和区域差异提供的腾挪空间优势,以培育和激活内需为重点,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化人口红利开发的需求侧改革。三是激发新时代人口红利。针对日渐雄厚的人力资本,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和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战略框架下,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活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面对规模依然巨大的人力资源,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等措施,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四是提升空间配置效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深化户籍、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共享,提升生产要素流动效率,统筹城乡就业政策、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口红利开发的配置机制。

总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是一种慢变量、潜变量和长周期变量。遵循传统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的相关理论,人口在数量、结

构、质量和空间等维度发展变化,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规律结果,形成连续且动态的人口机会,这决定了人口机会的存在性,即人口机会并不会消失,但会在量变到一定程度时发生质变。一国或地区准确把握人口机会的转型特征,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的潜在优势,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人口机会相互匹配,从而推动人口红利开发模式和主导作用的转型。若政策环境与人口机会相互排斥,该国或地区会错失在相应人口机会窗口内开发相应人口红利的最佳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最佳机遇之外也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开发难度极大。因此不能轻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应将研究视角更多地聚焦于最佳机遇的辨识层面,改革开放缔造的“中国奇迹”离不开对最佳机遇的把握,未来的“中国奇迹”也必须在新的最佳机遇中赓续奋进。

参考文献:

1. 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2. 陈友华(2005):《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6期。
3. 高培勇等(2019):《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经济研究》,第4期。
4. 林毅夫(2017):《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经济评论》,第3期。
5. 杨成钢、闫东东(2017):《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人口学刊》,第5期。
6. 原新等(2017):《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7. 原新、金牛(2021):《中国人口红利的动态转变——基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视角的解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8. 王广州、王军(2019):《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与新变化研究》,《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
9. Bloom D.E. and Williamson J.G.(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NBER Working Papers 6268.
10. Bloom D.E., Canning D. and Sevilla J.(2003),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1. Li G., Liang Y. and Shen K.(2016), Assessment of China's Qualitat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for Economic Growth During 2016–2020. *China Economist*. 11(1): 112–125.
12. Mason A. and Lee R.D.(2006),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Genus*. 62(2): 11–35.
13. World Bank(2016), Leveraging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A World Bank Repor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2(1): 155–161.
1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1),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21: Monitoring Health for the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朱 犁)